为了让一些真正优秀的学生能避开考试,更加专注于自己的读书生活,专家建议,并不反对完全的申请制,但这种制度最好在中国最好的高校进行。

博士生申请制面临“铺开”节点?

■本报记者 陈彬

最近这段时间,湖南某高校教师李本先的一篇博文“火”了。

这篇文章是关于很多高校都在试行的博士生“申请—考核”制度(以下简称博士生申请制)的。在文章中,李本先认为,如果高校全部采用这种制度,将会导致寒门更没有出路。而他的观点一经提出,便引起了一场关于博士生申请制利弊如何的争论。

或许是一种巧合,就在这场争论发生前两天,9月1日,清华大学正式对外宣布,今年该校将全面推进博士生申请制。本次改革适用于本科直博、硕博连读、公开招考等所有类型博士生招生。而在此之前,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早已宣布全面推行此项制度。

博士生申请制最早在中国高校出现试点是在2007年,算起来,今年正好是第10个年头。经过十年的发展,这项制度还存在哪些争议?当前是否又到了全面铺开的节点了呢?

图片来源:昵图网

肯定与困惑

10年前,那所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高校是复旦大学。那一年,复旦在医学博士招生中进行了博士生申请制的尝试。在此之后,国内开设类似试点的高校逐渐增多。这种趋势在2013年开始加速。因为在当年7月,教育部、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该意见明确要求各高校要“建立博士研究生选拔‘申请—审核’机制”。

在媒体的公开报道中,《中国科学报》记者并没有找到目前实施博士生申请制试点高校的具体数量,但据一份2014年的报道显示,在当年,国内就已经有70余所高校试点该项制度了。

“必须承认,从这几年的博士生申请制的试点来看,效果是不错的。”作为国内研究考试制度的著名学者,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对于博士生申请制这种不需要考试的录取方式,丝毫不吝惜溢美之词。

在刘海峰看来,博士生的选拔着重需要考察的是学生原有的学术基础、研究能力,以及其本身的科研潜质,而这些内容仅通过一场考试是很难作出判断的。“本科和硕士招生,更多考察的是基础知识,考试可以体现出学生的水平,但博士生需要更多考察的是能力,而这就需要面对面的交流了。”

在记者的采访中,对于博士生申请制,绝大部分学者都报以了肯定的态度,即使是对这一制度有所怀疑的李本先,也在博文中强调,严格意义上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

然而,制度的优秀并不代表着推行起来就会一切顺利。

余彤(化名)是武汉大学的一位博士生导师。2015年,武汉大学在全校范围内推行了博士生申请制,余彤和他的同事们也第一次通过这种方式招到了自己的学生。而在采访中,对于老师们的反映,他用了这样一个词——困惑。

“老师们的反响很大,但很多人也感到有些困惑,一些老师甚至倾向于原来的考试制度。”余彤说,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在申请制下,“人”的因素太多了,这让老师们“不厌其烦”。

“具体来说,申请制下,教师的权力增大,其好处是如果碰到非常优秀的学生,可以很容易地选拔出来。但如果遇不到这样的学生,老师们就会觉得有压力。”余彤打了个比方,如果三个学生申请,且条件差不多,你用什么方式说明某一个学生比其他两个更应该选择呢?学生们又如何信服呢?

文科与理科

众所周知,博士生申请制与考试制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增加了教授在录取过程中的发言权。这其实就是余彤口中“人”的因素。这种因素的增加,除了给老师们带来了一些困惑外,更直接的后果是增加了公众对于个别教师“徇私舞弊”的担忧。然而,在采访中,高教界人士却普遍认为,这并不是一个问题。

比如,在接受采访时,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便表示,博士生申请制作为“舶来品”,其得以顺利推行有赖于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导师对自身学术声誉的珍视;二是导师要资助博士生,要为博士生负担费用。

“中国之前存在的问题是某些教授并不在乎自己的声誉,学校也只在乎博士生规模,不在乎质量。此外,我们的导师资助制也不完善。这些都导致了博士生录取过程中的利益交换。”熊丙奇说,不过,近年来,国家也对博导制度作了很多改革,加之博士生数量减少,学校对博导学术研究的成果考核也越来越严。因此,大部分教授在招博士生时,已经不再如之前那么“随意”了。

熊丙奇的观点也得到了一些数据上的支持。

马军是兰州理工大学的一名教授。据他介绍,兰州理工大学目前有博导120余人,但每年的博士生指标只有60多个。“很多博导多年才能招到一个博士生,在这种情况下,导师怎么可能用这宝贵的博士名额作利益交换呢?”

采访中,马军表示,至少在理工科领域。导师利用博士生申请制徇私的现象“几乎是零”。但他同时也表示,在社科文史领域,由于导师的经费并不多,而且文科的硬性标准更少,导师的权力空间也更大,所以反倒有可能出现利益交换现象。

对此,作为文科导师的余彤显然不同意。

“首先必须肯定,在录取标准和考核标准上,理工科具有更好的标准性和客观性,毕竟理工科的科学研究数据和实验发表成果比我们更成熟,也具有更被广泛认可的渠道,但一个人是否有贪欲,和文理科是没有关系的。”余彤说,在面对考生的利益诉求时,所有老师的弱点和优点都是一样的,科学家不见得比人文学者更有人文操守。“我们觉得教师群体的毛病是共同的,即对真理和美德的培养和训练有所缺失。”

公平与正义

在此,我们需要再提一下本文开头时,曾引起一片争议的那篇博文。

在接受采访时,李本先这样总结了自己博文的观点:“出身贫寒的人大多不善交际,在申请—审核制度下,沟通交流能力的不足很容易导致申请不利;而且申请制的主要考核指标很可能是论文,但寒门学生由于受到经济条件的约束,一般都没钱发文章;此外,寒门学子由于受到先天的自然及社会关系的限制,是很难找到很牛的‘老板’为其撰写推荐信的……”

对于李本先的观点,很多博友并不认同,在他们看来,博士生指标的稀缺性已经导致博导要花大气力挑选优秀人才,李本先“多虑了”。

然而,在记者的采访中,很多学者其实是赞同寒门学子在博士申请制下会有所不利的观点的。比如刘海峰便提到,只要存在面试程序,对寒门学子都会产生不利,而且这种现象并不只在中国存在。“加州理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原来的院长就曾表示过,他们学院经过调研已经得出结论,只要存在面试,对家庭背景弱的人都比较不利。”

但与此同时,刘海峰也坦言,博士生招生原本就是一个更加看重效率的行为。“本科招生时,公平要排在首位,但博士生招生要更加体现个体性。”

对此,余彤表示,博士生招生的公平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在他看来,博士教育应该是着眼于高深学问的教育,这种更高级的学位教育更多地考虑的还是效率问题。“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诉诸公平。由于地域经济条件发展,寒门学子有些不利因素固然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我们不能因为状况令人痛苦,就把一些事业变成‘慈善事业’。”

“不要简单地诉诸社会正义感,它会让一个简单的利害参半的事情变得扑朔迷离。事实上,考试制和考核制都有自己的优缺点,本身已经很难判断哪个更有利,如果再加入更多的考虑因素,就会变得更加复杂,这种复杂度到了一定程度,制度就无法保证了。”余彤说。

全面与部分

事实上,针对公平性问题,李本先在博文中已经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那就是采用申请制与考核制相结合的制度,具体来说,就是每年拿出30%的博士生招生名额用于申请制。剩余的70%还是要通过考试制选拔,从而给寒门学子一次机会。

李本先的观点其实和目前的“大潮流”并不一致。因为正如之前所说,近两年,越来越多的高校正在将申请制由试点转为全面铺开,完全的申请制似乎被越来越多的学校所接受。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赞同从此废除考试制。

“在中国的教育条件下,我觉的还是应该有一个考试的‘门槛’。”对于这一问题,余彤觉得目前中国的专业教育在某些方面还有很大的缺失,而考试则可以促使学生加强基础知识的储备。“我的专业就有很高的门槛。在考试制度下,其他专业学生想考进来,就必须把基础知识背一遍,这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当然,为了让一些真正优秀的学生能避开考试,更加专注于自己的学习和科研,余彤也并不反对完全的申请制,但这种制度最好在中国最好的高校进行。“比如北大、清华。”在他看来,北大、清华可以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并有能力设计出严格的考核环节,认真评估学生的博士生研究计划以及相关研究。“这些人经得起你的折腾。”

对此,熊丙奇表示,从长远来看,取消考试制度是研究生选拔的大势所趋,因为考试除了关注公平之外,很难起到选拔能力的作用。但是,申请制的实施同样需要相关制度把关,而我们在这方面依然欠缺。

“我们推出了一系列考核制度,也在逐渐向这一方向前进,但我们并没有完全建立相关的外环境,比如没有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资源还在依靠行政配置,导师资助制也有一定争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些现实问题。”熊丙奇说。

现场

女排姑娘的北大之旅

■本报记者 温才妃

“女排姑娘要来了。”一时间,消息迅速传遍了北京大学,前来新太阳活动中心排队领票的学生排成了长龙。一些学生甚至凌晨就起来排票,为了一睹女排风采他们也是“拼了”。

9月5日下午,中国国家女子排球队到访北京大学,受邀参加在北大邱德拔体育馆举行的纪念“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提出35周年暨北京大学开学第一课主题活动。

北大学子的热情瞬间将女排队员们包围。

女排现身

“是惠若琪、朱婷……”走下大巴车,女排姑娘们被夹道欢迎的北大学生们簇拥着,学生们纷纷向自己喜爱的女排队员们送上鲜花。

而在体育馆内,迎接女排的热忱也不减。一段回顾女排奋斗历程的精彩视频后,北京大学艺术团的学生带来了开场歌舞《红旗飘飘》。鲜亮的红旗为幕,青春的身姿、激扬的歌声,将人们的思绪带回了北大与中国女排交集的多个瞬间。

35年前,北大学子庆祝中国男排冲出亚洲,高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成为引领那个时代发展的最强音。同年,中国女排首次荣获“世界杯”冠军。35年后,在里约奥运会赛场,中国女排再登世界巅峰,展现出一辈辈传承至今的女排精神,再一次振奋了国人。

8月23日,北大学子前往首都国际机场,热烈欢迎中国女排载誉归来。

“女排精神、体育精神早已根植北京大学,与北大精神紧紧融汇在一起。”在致欢迎词环节,北大党委书记朱善璐如是说。他还给在场师生布置了一个作业——认真思考“什么是女排精神?北大人如何学习弘扬女排精神?”

在4000多名观众山呼海啸般的“学习女排,爱我北大;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呐喊声中,女排姑娘们从幕后来到台前,现场顿时报以热烈的掌声。

“啊!女排真人比屏幕上的更美……”在主持人介绍女排队员的同时,台下的观众早已按捺不住一颗激动的心,不少人舞动着海报、荧光板,与舞台上四射的光柱交织着,现场气氛堪比“歌友会”。

作为女排代表,惠若琪、魏秋月、朱婷、袁心玥四位队员被主持人请到台上。那么,她们又要与北大学子们分享哪些“小秘密”呢?

分享“小秘密”

她们可以在赛场上严肃紧张,也可以在讲台前俏皮可爱。

在里约奥运会上当选“最有价值球员”(MVP)的朱婷,现场被人揭开了“逗比”的一幕。只见一组“服不服”“不服再来”“打到你服”的表情包从天而降,朱婷笑得捂住了嘴。当主持人问她平时和队友聊天时会不会用这些表情包,她机智地答道:“平常我们都用朗导的。”

“小苹果”袁心玥在世锦赛上被一名记者问道“会不会唱《小苹果》?”她随口哼唱了两句。谁想第二天“小苹果”便成了她的昵称。在活动现场,主持人希望袁心玥“再来两句”,她一面笑着说:“希望大家别介意自己跑调”,一面唱出了“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可爱的模样,宛如邻家小妹。

对于女排的平日生活,不仅主持人好奇,在座的学生们更是想知道。女排队长惠若琪表示,“其实很接地气”,平时小姑娘的喜好,如吃饭、看电影、唱歌、自拍,她们也都会做。不过相对于较为休闲的大学生活而言,她们一周只能休息一天,“奥运会后我们整理战术本,那感觉就像是高考结束了一样。”惠若琪回忆道。

魏秋月是球队里的老将,她曾参加过2008年和2012年的两届奥运会,还曾是球队队长。现场有一位小伙子扫二维码向魏秋月表示“爱意”——“小心地问一句魏秋月女神,现有一北大理工男,身高略低于一米九,穿袜子一米六五,但是我觉得未来科研潜力无穷,会考虑吗?”魏秋月迅速地反应道:“请这位男生先站起来,让我看一下你的潜力。”现场顿时引发一阵“搜人”的热潮。

与女排姑娘们同席的还有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北大女子排球队教练黄建滨,光华管理学院学生、山鹰社社长赵万荣,教育学院学生、红十字会学生分会会长李晓丹。他们与在场师生共同分享了与女排、排球交集的点点滴滴。

游戏拉近距离

有女排出现的地方,总会有人忍不住想要与高手过过招儿。尤其是台下的北大女排,她们早已“按捺不住”了。

定点扣球,比的是在规定时间内投入网中的排球数量。作为中国女排队长,惠若琪现场传授起垫球的秘诀。然而,尽管北大女排连用三条锦囊,施计把惠若琪请到自己的队伍中,甚至动用了机器臂投球,但奈何实力悬殊,最终北大女排还是不敌中国女排,以39:70收场。

也许这样的比赛结果也是北大学生预料之中的。游戏之外,他们还穿插了学生歌唱、魔术、科技作品展示等互动节目,一时间整个舞台上充满罗曼蒂克的氛围,北大学生既懂科技,又能玩音乐,还能变出玫瑰花、项链讨女排姑娘的“欢心”,在多才多艺方面成功地为自己“扳回了一局”。

惠若琪现场为观众演示垫球。 王天天、李香花摄

时间在欢呼声中过得很快。活动接近尾声,一个不能或缺的环节——北大学子和女排队员互赠纪念品到来了。

原来,在活动开始之前,女排队员受邀来到北大校园内“振兴中华”纪念碑处合影留念,而此刻北大学生代表将刻有“弘扬女排精神,筑梦伟大复兴”主题的装帧相框及《北大讲座》精华集赠送给女排队员,寓意北大精神与女排精神交相辉映,携手前行;女排队员也向学生代表回赠中国女排全体队员签名的里约奥运会用球,寄托对北大的深厚情谊和美好祝福。

“我要把这世界为你点亮,今天我终于站在这年轻的战场;请你为我骄傲鼓掌,今天我将要走向这胜利的远方。我要让这世界,为我激荡。”伴随着女排队员与北大学子、校友代表合唱的一首《年轻的战场》,活动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中国大学评论

降低高考难度?请慎行!

■李锋亮

新学年开学之际,关于教育的各种话题又铺天盖地而来,而《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也应景式地转载了一篇短文《孩子,我宁愿欠你一个快乐的少年,也不愿看到你卑微的成年》,很快和这篇文章相关的话题就在“知乎”上引起了热议。这篇短文大致是针对中小城市经济水平中等或偏下的家庭而言的,如果孩子不通过加倍的努力学习考上不错的大学,那么等这些家庭的子女成年后,他们面临的生存压力将是巨大的;所以为了孩子未来的幸福,这些家庭还是应该督促孩子努力学习,目标就是考上一所不错的大学。在“知乎”上对这篇文章的讨论更加激烈,“中国并不是只有几百万的富人,一两个亿的中产。还有比他们多得多的低收入者,当这些低收入者进阶无望的情况下,暴力,可能是唯一改变的办法……当穷人失去希望,他们不会放弃挣扎,他们会重拾暴力”。

笔者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父母是小城市的普通双职工,从小就是听着父母“要努力学习,考上大学才有出路”的话长大。笔者很幸运最终通过努力获得了去知名大学读书的机会,再通过努力读了硕士和博士;然而,身边的很多亲戚、朋友甚至自己的姐姐,由于没有上大学,现在的生存压力都是很大的。所以,当笔者看到“知乎”上这些讨论的文字时,并不觉得是危言耸听,相反却有强烈的共鸣。

根据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的观点,自从隋唐设立科举制度以来,教育和考试一直是中国底层人民打通上升通道最主要也是最能够带来社会效益(包括政治与领土统一)的社会机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而言,无论如何都要让底层人民看到自己能够通过教育获得上升的机会,否则执政阶层将失去合法性,社会很快也将会发生剧烈动荡。

基于上述理念,降低高考难度将会带来一系列恶果。逻辑如下:如果简单将整个社会分为上、中、下三层,降低高考难度,受益最大的肯定是上层。因为降低高考难度,那肯定要增加别的选拔方式。无论是获得推荐、志愿者公益、科技、文艺、体育等,上层家庭的子女都由于其家庭具有强大的金钱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在面对中层和下层家庭的子女竞争时,具有绝对的、碾压式的优势;而只有能吃苦,是三个阶层的子女可以同台竞艺的比赛项目。所以,虽然高考难度保持相当的水平,会带来加重孩子学习负担、引发题海战术,甚至压制很多孩子的创新等一系列让人深恶痛绝的负面后果,但是却能让中下层的孩子在自己天生劣势相对最小的方面去努力,让下层的孩子看到向上流动的希望、让中层的孩子看到能够保持或者向上流动的希望,同样也会让上层的孩子与家庭知道自己如果不努力,自己的家庭不能轻而易举地利用已有的优势资源继续保持垄断地位。

如果高考难度不能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标准,教育系统无法完成不同能力层次个体的筛选,劳动力市场同样也无法作出这样的筛选,这样就会导致两个致命的结果,其一是阶层固化,其二是整个社会的竞争力与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可见,高考难度下降,虽然能够给一些孩子带来快乐的童年与少年、能够让一些孩子更充分地发挥自己的天性与天资,但受损的将是整个社会。

如果降低高考的难度,受益最大的肯定是上层家庭的子女,他们可以为自己将来获取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与就业机会获得名正言顺的合法性。如果降低高考难度,可能会有一些来自下层家庭的子女由于概率的原因获得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机会,最终实现向上流动,但是这会给整个下层传递一个信号,那就是靠自己努力没用,成功更多是靠运气。那么,这对整个社会而言,绝对是一种灾难。因为努力是一个社会向上的永远动力,没有努力,什么创新都是奢谈。还有更为关键的是,如果下层人民发现努力没有用,暴力反抗将至。所以,千万不能以各种名义降低高考难度,更不能妖魔化学习成绩,而是要继续营造努力学习才有可能成功的社会氛围。

总之,如果高考难度降低、如果让广大人群觉得努力学习没有用,受损最大的将是整个社会,重视教育、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尊重知识、吃苦耐劳、不反智的传统将迅速瓦解,而且阶层固化将一发不可收拾,并给整个社会带来缺乏流动的巨大隐患;毕竟通过考试而非通过推荐是人类社会经过惨痛教训摸索出来的选拔人才、促进社会流动的制度设计。总之,为了长治久安,降低高考难度,请慎行!